

中國學術叢書

明
文
學
史

宋佩章著



明文學史

引言

明代的正統文學——或稱傳統文學——約可分爲五個時期來敘述：

一、明開國至永樂初；

二、永樂初到成化、弘治間；

三、弘治、正德之際；

四、嘉靖、萬曆之際；

五、從天啓初以迄明清之交。

在第一個時期裏，散文方面，則如黃宗義明文案序所說：「有明文莫盛於國初……當大亂之

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註一）韻文方面，則如陳田明詩紀事序所說：「明初詩家，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出，無前後七子相矜相軋之習。」（註二）而因時代環境之不同所引起文學上作風的變遷，也很顯然地可以見到的：明初的大作家如宋濂、劉基、王禕等，雖以「師友講貫，學有本原」（註三）之故，其作品猶承勝代遺風；然元末楊維禎一派的纖穠縝麗的詩文，已引起一般人的反對；（註四）而後人批評明初有名作家的詩文，往往稱其能脫元末纖穠之習。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末代和盛世，文學上的作風是不相同的。

第二個時期是比較長期的太平時代。詩文亦趨於雍容平易之一途，而三楊的臺閣體便就風行了一時。雖有不少才氣橫溢的作家，其詩文並不爲臺閣體所囿，但風會所趨，終流於和平渾緩之音。

到了第三個時期，已經不是一個太平的時代了：那時候西北被寇患，權閹專朝政，往日的太平時代已一去而不復還；而雍容平易的詩文，遂不爲時代所許。於是李東陽一系所謂「茶陵派」的詩文起而代之，臺閣體的末流爲之一振。到了李夢陽、何景明等所謂「前七子」者出，倡文學復古

之論，天下靡然從風，詩文的作風爲之大變；而茶陵派終等於衰周弱魯，力不足以禦強橫。

在第四期之初，復古派摹擬秦漢盛唐的詩文，已稍稍爲人厭棄，於是王慎中、唐順之等提出「變秦漢爲歐曾」的口號，歸有光繼起，爲文務在文從字順，一洗聲牙詰屈之弊，天下又靡然從風。然王唐歸等的文章，一以唐宋人爲矩矱，雖跳出了秦漢的圈套，但還是落入唐宋的圈套；尤其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成了窠臼，於是李攀龍、王世貞等所謂「後七子」者，承李何餘緒，再倡文學復古之說。前後七子隔絕數十年，而此唱彼和，如出一轍，後七子的聲勢，且駕前七子而上之。其後效顰者陳陳相因，幾等於萬喙一音，物極則變，於是淺率的「公安體」，纖仄的「竟陵體」相繼代興。這一個時期是政局上不安定的時期，同時也就是文學作風變遷多端的時期。

明代文學從復古派的庸廓數變而至公安、竟陵派的淺陋，其弊已極。然而從天啓以後一直到明亡，因社會的劇烈變動，士大夫受了非常的刺戟，發爲詩文，遂多慷慨激昂之作。南都以後，殘山剩水，再也不能支持的了，於是繁霜板蕩之詩，黍離麥秀之篇，悲感淒惋，成了一時的作風。明代文學到

了那時候顯然又換了一個時期。

明代文學的幾個變遷時期，已略如上述。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的起來，很明顯地是對於雍容平易的臺閣體和格律謹嚴的茶陵派的詩文的反動。但是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在着就是：對於八股文的反動。明初用八股取士，實行散文的駢體化；成化以後，體式益完備，結果造成一種比六朝的駢文更做作更不自然的排偶體。國家以此取士，士大夫以此爲進身的工具。當時士大夫的精神大半都消費於八股文的練習，作詩做散文是他們的餘事。而士大夫的才思聰明既爲八股文所束縛，又值太平時代，感不到什麼刺戟，發爲詩文，自然逃不出雍容平易之一途。到了時代將變，那些平淡無奇的詩文，固已爲一般人所厭棄，同時對於「體用排偶」（註五）的八股文，更起了一種下意識地的厭惡。這時候文章方面化排偶爲散體，詩歌方面反譚綏爲雄健，差不多已成爲時代的要求。李夢陽等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使人知道四書五經外還有古書，代聖賢立言的八股文外還有散體的秦漢文，譚綏的臺閣體的詩外還有雄健的盛唐詩，正合着時代的要求；所以振臂一呼，應者四起。這個文學復古的新趨勢，到了嘉

靖中歸有光等倡爲歐、曾之文，其勢稍殺。然歸等爲文，亦以古人爲矩矱；而其作品，除幾篇敘事文外，往往闖入八股文的境界，這當然不能把復古派完全打倒的。後七子的第二次文學復古運動，是必然要到來的時候，那更不用驚奇了。

在復古派的詩文的作風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點時代的背景。復古派的詩文，有兩點最爲後人口實：第一是摹擬或剽竊；第二是虛矯或膚廓。剽竊是由於摹擬而來，凡摹擬未有不流於剽竊的。然而這摹擬習慣的養成也是由於八股文。八股文須「代古人語氣爲之」（註六）其精神全在摹倣古人，不說自己的話。明代士大夫經過了長期的八股文的訓練，已不知不覺養成了摹倣的根性，復古派儘以起衰救弊爲己任，儘怎樣地高唱「文必秦漢」，卻終於逃不出這「摹倣古人」的圈套。這是時代的桎梏，任憑你怎樣聰明睿智，都擺脫不了這個桎梏！至於虛矯或膚廓，終歸一句就是不切實的強作壯語。這也是時代使然：因爲那時候朝政不綱，亂象已成，士大夫都有匡救時俗的壯懷，然卻沒有感受到切實的苦痛，強作壯語，正是這個時代士大夫階級意識的表現。到後來國事日非，士大夫由浮誇而頹唐了，公安、竟陵體的詩文風行的時候，并這「強作壯語」的豪氣而無之一。

等到大變動來臨，士大夫們才遽然驚覺，文學作風也就趨於慷慨激昂。然而到那時候已經是明代文學總結帳的時候，更不容他們爭論什麼文必秦漢或文師歐曾了。

我們拿全部中國文學史來觀察明朝一代的正統文學，誰也不能無寂寞之感。黃宗羲輯明文案，以明代有名的散文作家宋濂等十人爲甲案，然而他說：「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嘗有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而論，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註七）至於韻文方面，只有一高啓可當一代大作家；其他也不過就一章一體以論其短長而已。這三百多年文壇上的黯淡的空氣，是怎樣造成的呢？那又不能不歸咎於八股文。黃宗羲說：「此無他，三百年人士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註八）散文如是，韻文何嘗不然！因此，我們論述明代文學，便不能無視八股文，在本書的末章，要特別把八股文作一個有系統的論述。

最後，編者有重要的聲明：本書中把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的明代的傳奇和小說，置之不論，是因爲本叢書中另有鄭振鐸先生的專篇敘述，爲避免重複，就將這一部分刪去了。

(註一)見南雷文約。

(註二)陳田明詩紀事甲籤序。

(註三)語本明史文苑傳序。

(註四)如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詆斥維禎的詩文。

(註五)語本明史選舉志。

(註六)同上。

(註七)見南雷文約明文案序上。

(註八)同上。

第一章 明初文學

第一節 明初的散文作家

明初文學，承元末遺風，而散文作家，首推宋濂。元末文章，以吳萊、黃潛、柳貫爲一朝後勁。萊文蘄絕雄深，以宏博著稱；潛、貫的文章，都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濂初從萊學，繼又師事潛、貫，學問淵源，悉有所受，其散文遂爲一代之宗。

宋濂（註一）（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徙居浦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明初以書幣徵，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老致仕。長孫慎坐法，舉家謫茂州，道卒。正統中追諡文憲。所著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他小時候讀書是非常刻苦的家，貧，沒有書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嘗讀書青蘿山中，

幾年沒有下書屋，得鄭氏所藏書數萬卷，無不盡閱。學既刻苦，授受復有淵源，故所爲文雄峙一代，爲開國文人之首。當時他文名遠播異域，外國使臣來朝貢時，每問「宋先生安否？」高麗、日本都出重價購買他的文集。明史濂本傳說他「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說：「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今錄其王冕傳，以見一斑。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

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生。

北遊燕都，館祕書卿秦不花家。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返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誦之，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之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長短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案，言越有狂人，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筴，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遑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明初的散文作家，宋濂外要推劉基、王禕。而方孝儒受業於濂，努力繼之，雖所養不及濂之粹，要亦不失爲一代作家。

劉基（註二）（一一三一——一三七五）字伯溫，青田人。元末進士，官高安丞，有廉直聲，後棄官歸。明太祖定括蒼，聘至金陵，佐太祖定天下，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明初諸大典制，都是他與宋濂等計定。封誠意伯。以弘文館學士致仕。後爲胡惟庸所構，憂憤卒。正德中追諡文成。有誠意伯集二十卷。明史基本傳說他的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然他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所以他嘗在太祖前論當世文章，亦推濂爲第一，而自擬第二。四庫提要說他的散文「閎深肅括，亦宋濂、王禕之並。」今錄其賣柑者言以示例：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

「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邪？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柑以諷耶？

王禕（註三）（一二二一——一二七二）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徵爲中書省掾。修元史成，拜爲翰林待制，同知制誥。使雲南，抗節死。追諡文節，改字忠文。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他少師事柳貫、黃潛，與宋濂爲同門，又同修元史。太祖嘗對他說：「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宋濂敍他的集，說他的文章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大概他的文章，其長處在平易切實，脫去元人亢沓

之病。後人因他抗節死義，文以人重，對於他的文章遂多溢譽，至有說他「體製明潔，當在宋濂之右」者，實非篤論。鄭瑗并觀瑣言說他的文章「精密而氣弱」，庶乎近之。其時齋先生俞公墓表云：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怒馬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

先生諱金，字叔器，別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尚道務義，爲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諱，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諱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臺、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恣益，恣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

金氏。

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辨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疏矣。使更閱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方孝儒（註四）（一三五九——一四〇二）字希直，一字希古，號正學，天台人。以薦授漢中府

教授。建文中，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改文學博士。燕王篡位，抗節死。所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四庫提要說：「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他的文章素養，雖不及宋濂那樣醇粹，然而他做文章主張「神會於心」，和後來之摹擬剽竊者全然不同。他在蘇太史文集序中說：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譬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沒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

明初的散文作家，當以上述諸人最爲大家。其次如陶安（註五）字子敬，當塗人。有陶學士集二十卷。他的文章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危素（註六）字太樸，金谿人。有說學齋集四卷，雲林集二卷。四庫提要說他的文章於歐、虞、黃、柳之後，屹爲大宗。蘇伯衡（註七）字平仲，金華人。有蘇平仲集十六卷。

他的文章蔚贍有法，然病在用意太苦，遣詞太繁縟云。胡翰（註八）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有胡仲子集十卷。他少從吳師道，吳萊學爲古文，故其文多得二吳遺法。徐一夔（註九）字大章，天台人。有始豐稿十四卷。他的文章謹嚴有法度，無元末冗沓之習。王彝（註一〇）字常宗，其先蜀人，遷嘉定。有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他的文章以渾謹見長，但往往持論過激，集中文妖一篇，係詆斥楊維禎而作，後人頗病其詬詈傷雅。張孟兼（註十一）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有白石山房逸稿二卷。他文章溫雅清麗，具有體裁；劉基嘗推宋濂爲第一，自己居第二，第三就是孟兼，時人以爲定評。孫大雅（註一二）名作，以字行，江陰人。他的文磊落奇偉，而隱有程度，自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推挹甚至。趙撝謙（註一三）名古則，後更名謙，餘姚人。有考古文集二卷，又有六書本義等。他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然所作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烏斯道（註一四）字繼善，慈谿人。有春艸齋集十卷。他的文章夷猶淡泊，頗近自然，不爲劍拔弩張之狀。龔毀（註一五）鉛山人。有鵝湖集六卷。他的文章原本經術，以結構謹嚴稱。鄭真（註一六）字千子，鄞縣人。有滎陽外史集七十卷。他與其兄駒弟鳳並以文學擅名，而他的古文尤稱於時，說者謂可肩隨宋濂。陶宗儀（註一七）字九成，黃巖人。他雖不以詩文著，然所作輟耕錄，